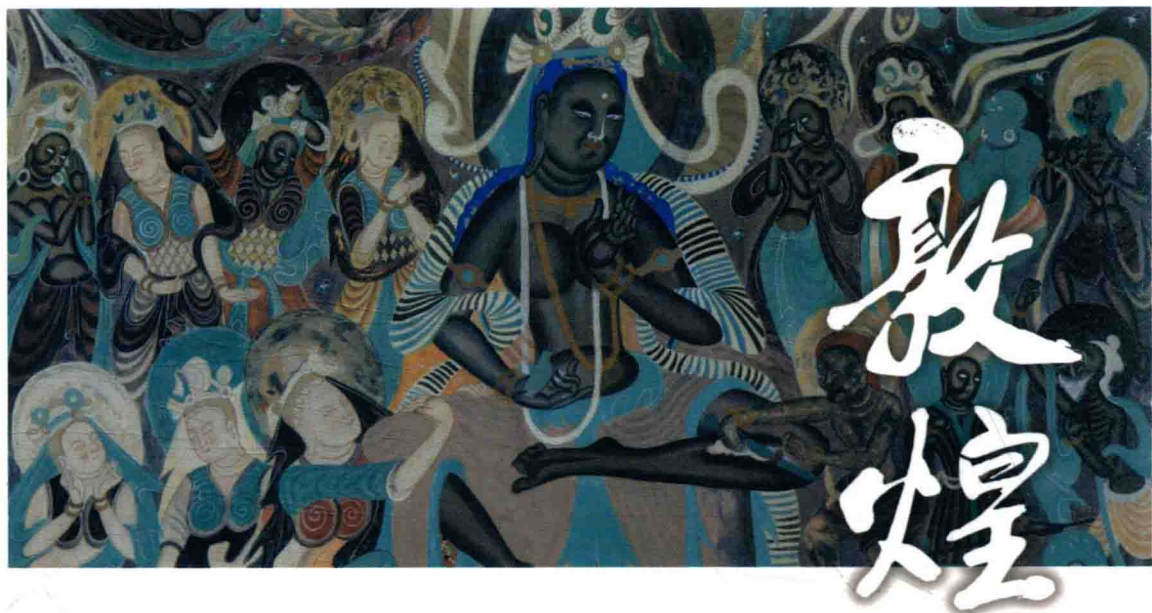




敦煌 汉文文献题记 整理与研究

朱瑶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敦煌

汉文文献题记 整理与研究

朱瑶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汉文文献题记整理与研究 / 朱瑶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8299 - 4

I. ①敦… II. ①朱… III. ①敦煌学—文献学—研究 IV. ①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406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吴丽平
责任编辑 刘芳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 268 千字
定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敦煌汉文文献题记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2YJC770078)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史回顾	(2)
二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2)
三 研究对象的界定	(14)
四 材料来源	(16)
五 本书章节设计和研究方法	(17)
六 本书引用文献名词略称	(18)
七 本书题记录文规范	(20)
 第一章 敦煌文献题记概述（上）	(21)
第一节 题记的定义	(21)
一 “题记”释名	(21)
二 敦煌文献题记的指称	(27)
第二节 题记的甄别	(34)
一 题记的真伪	(34)
二 题记的是非	(40)
 第二章 敦煌文献题记概述（下）	(47)
第一节 题记的分类	(47)
一 根据文献生产及装帧形式分类	(47)
二 根据文献内容性质分类	(48)

三 根据题记内容分类	(49)
第二节 题记的书写位置	(80)
一 卷轴装文献	(80)
二 册子本文献	(88)
三 佛画	(90)
第三节 题记的题写特点	(97)
 第三章 佛教文献题记研究	(116)
第一节 中土佛教经典崇拜	(117)
一 佛教的宣传	(117)
二 本土的需求	(124)
第二节 造经者与造经目的分析(上)	
——政府、皇室、贵族造经	(126)
一 图书性质的写经	(127)
二 祈愿性质的写经	(139)
三 官府、皇室、贵族造经的特点	(150)
四 官府、皇室、贵族造经的目的	(152)
第三节 造经者与造经目的分析(下)	
——僧尼、官吏、民众写经	(157)
一 僧尼、官吏、民众写经简述	(157)
二 僧尼、官吏、民众造经的目的	(164)
第四节 写经题材和祈愿文字之衍变	(168)
一 写经题材的变化	(168)
二 祈愿文字的变化	(178)
 第四章 道教及三夷教文献题记研究	(183)
第一节 敦煌道教文献综述	(183)
一 敦煌道教史迹	(183)
二 敦煌道教文献	(185)
第二节 经教化传统下的敦煌道教写经活动	(187)

◆ 目 录 ◆

一 题记的数量和涉及文献的种类	(187)
二 题记所反映的敦煌道教写经活动	(188)
第三节 道教题记愿文及题记盟文	(203)
一 题记愿文	(203)
二 题记盟文	(206)
第四节 “三夷教”文献题记略论	(211)
一 摩尼教文献及题记	(212)
二 景教文献及题记	(218)
三 祆教文献及题记	(220)
第五章 四部文献题记研究	(221)
第一节 四部文献题记综述	(222)
一 附有题记的四部文献种类及数量	(222)
二 题记的内容与书写者	(225)
第二节 题记所见之敦煌学校教育	(227)
一 十六国时期的敦煌学校教育	(228)
二 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学校教育	(229)
三 敦煌学校教育的特点	(237)
余论	(241)
一 敦煌文献题记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241)
二 敦煌文献题记研究可深入之领域	(245)
附录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英藏、法藏题记校补	(246)
参考文献	(263)

绪 论

写本时代在中国古代书籍史上是个重要时期，然而传世的古写本却凤毛麟角。敦煌文献的发现，使4—11世纪的数万件写本作为书籍史上的宝贵资料而获见至今。其中80%是汉文写本，将近90%的内容是佛教文献。除佛教以外，道教、摩尼教等宗教文献和非宗教文献的各种写本，仅占10%。就汉文写本来看，大部分写本卷首残失，损伤严重，而卷尾的残存率却比较高，因此，通常书于卷末的题记大量保存了下来。敦煌遗存的佛教文献，少部分写本是宫廷颁赐的范本流入敦煌，其上有完整的宫廷写经题记乃至译经题记；有些则是各个寺院的藏经中替换下来的废弃残本，其中少量存有题记，多是些简单的书手题名、校记、勘记等，纪年信息很少；与此相反，大量的供养经中却往往保留了写经纪年和题记愿文；僧尼日常持念的经本及学习用的教科书、听课笔记等也幸运地存留下来，其中亦可见到当年使用时随手写下的题记。道教文献以盛唐写本最多，其在藏经洞的保存可能是由于安史之乱后道观急速衰落，道经写本成为废纸被佛寺加以利用而存留。^①一些宫廷写本上保存了官经生所写的题记，而民间写本题记则多是道士的抄经记录和清信弟子受经戒时间、仪式和盟誓的记录，少数写本上写有祈愿题记。宗教文献之外，中国传统四部书的出土也尤为值得注意。经史子集各部书籍都有遗存，这些写本有的来自州县学或官府的藏书，有的则是个人学习的读本，也是作为废纸以便再次利用而被寺院收集起来，其上可以见到不少州县学、寺学或私学学生的书写题记。

^① [日]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解说》，李德范译，《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3期，第90页。

这些题记，繁简不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风俗习惯、职官制度等，对历史、社会、宗教、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 研究史回顾

敦煌文献发现之初，英法探险者在藏经洞中翻阅拣择时，就注意到了写卷上所载之题记。精通汉学的伯希和特将有题记纪年者挑选出来，题记对于写卷研究潜在的价值受到重视。前人对题记的研究分为三个领域，一是题记资料的整理；二是题记作为一类研究辅助资料被使用、以资考证；三是将题记作为书籍史、宗教史研究上的一个客观对象来研究。前两者与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共同起步，题记担任了助研角色，丰硕的研究成果使题记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直接导致后起的将题记作为对象的专门研究。

（一）题记资料的整理

敦煌学研究伊始，写卷题记因其中有关于纪年、抄写、校勘、祈愿的内容，于分析写本年代、写卷真伪、考证历史、探究宫廷及民间的写经活动等均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故而整理题记资料便成为学界的自觉行为，延及至今。

最初采录题记的是罗振玉之子罗福苕，其编撰的《古写经尾题录存》与其弟罗福葆所编《补遗》，^① 辑录 147 件佛经题记，分类编排，同时插有关于纪年和经文性质的考证，至今仍值得参考。罗文发其首，后有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②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补遗》^③、陈祚龙《敦煌古钞内典尾记

① 此二文收入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上虞罗氏貽安堂凝清室，1921 年。

② 此书通过对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整理，辑录了 432 件题记，网罗了无纪年、简单署名、校记等各种题记。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解说》评价其为“本来意义上的题记辑录专书”。

③ 此二文将海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纳入辑录范围，所收题记有 770 件左右，是当时最丰富的辑录。但因为北图藏品之外的大部分藏品转引自罗福苕、矢吹庆辉、翟理斯等人的录文和《大正藏》及《昭和法宝目录》，其中多有脱落、误记情况。

汇校》(初、二、三编)^①《新校重订〈敦煌道经后记汇录〉》^②继其余绪,分别辑录了佛、道二教文献题记。而集大成者当属池田温所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汇编了中外所藏历代写本题记两千余条,以年代为序排列,每条之后附有参考文献,将前人刊布、整理、研究工作一一列出,以备参阅。此书无论辑录题记的数量还是整理水平,都超过了以往同类著作。^③

题记整理专文、专著之外,前代学者为各收藏单位或私人收藏者的藏品编撰的目录中对题记也做了详细载录。英、法、中、俄四大收藏地的藏品目录,以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汉文纪年写本〉》《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④、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⑤、陈垣《敦煌劫余录》《敦煌劫余录续编》、孟列夫《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⑥为代表,对写本题记做了详尽的著录和介

① 《初编》据《守屋孝藏氏搜集古经图录》《龙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乾、坤两册)而成,收题记54条;《二编》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卷《古逸部与疑似部》所作之有关札记而成,收题记53条;后又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内有关英藏和法藏的汉文写卷中未经收入《初编》《二编》之零册散简续成《三编》,收题记525条。共收佛教文献题记632条,现一并收入《敦煌学要笈》。

② 陈氏先在《大陆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十期发表《敦煌道经后记汇录》,后又据吉冈义丰《スタイン将来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道教之部”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进行补正,成此《新校重订〈敦煌道经后记汇录〉》,收入《敦煌学要笈》。

③ 参见〔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解说“译者的话”》,《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3期。

④ 翟理斯编写的《斯坦因搜集的汉文纪年写本》一书,将所有带纪年的文书、记录都作为著录对象,包含近三百件敦煌写本题记,并将每一条题记译为英文,对题记的解说甚详。后又编《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参见《敦煌丛刊初集》第1册),将无纪年的题记也辑录在内,但省略了题记的详细解说,故而两书都具参考价值,可以并用。

⑤ 法国学者对法藏敦煌文献所做之编目中也对题记有所著录。隋丽攻整理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题记初录》将纪年卷按年代顺序排列,同时标出写卷编号、题目,并抄出有关纪年的录文,可与王录互校。伯希和自编的目录由罗福长和陆翔译出,分别刊登在《国学辑刊》1卷4号(1923)、3卷4号(1932)和《北平图书馆馆刊》7卷6号(1933)、8卷1号(1934)上,其中有对纪年和题记要点的摘录。巴黎国立图书馆也编制了详细的解说目录,谢和耐、吴其昱主编的第一卷(P.2001—2500)和米歇尔、苏远鸣主编的第三卷(P.3001—3500)已出版,对题记的著录没有王目周全。

⑥ 孟列夫《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著录了俄藏敦煌文献中约十分之三的内容,有关题记的要点被译出介绍,第二册所附之《敦煌写本的年代》,有对纪年题记的详细说明。此书中文版由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袁席箴、陈华平翻译,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绍。日本收藏品则有中村不折、施萍亭、王三庆、马德等学者所撰之目录，对书道博物馆、京都有邻馆、三井文库等十处藏品分别介绍，并将所存题记逐一著录，是我们现在研究最易获得的日本藏品资料。^① 港台藏品，以潘重规《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题记》^②、郑阿财《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卷子题记》^③著录最为详赡。国内各收藏地亦陆续编写目录介绍各自藏品，目录一仍旧例，皆全面著录题记信息。^④ 此外，王重民、刘铭恕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对英、法、中、日藏品的汇编，施萍亭在此基础上

① 《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宝集成》（图录）附录“收录图版目录及解说”，按年代顺序载录了中村所藏吐鲁番、敦煌写经的题记。参见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研究成果《东アジア善本丛刊》第二集，2005年3月18日发行。施萍亭《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二、三）著录了三井文库、京都有邻馆、唐招提寺、法隆寺、国会图书馆、大东急纪念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品，共收录题记41条，参见《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1994年第3期、1995年第4期。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日本所见敦煌写卷目录提要（一）》著录天理图书馆、唐招提寺、大谷大学藏品，共收录题记26条，参见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及《敦煌学》第十五辑。马德《滨田德海文书题记选录》著录滨田德海旧藏，共收录题记14条，《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共收录题记19条，《敦煌学》第二辑，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1975年，第1—55页。

③ 共收录题记8条，《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402页。

④ 秦明智：《关于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之浅考和目录》；荣恩奇：《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藏敦煌经卷录》；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上、续）；刘国展、李桂英：《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张玉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苏裕民、谭蝉雪：《永登县博物馆藏古写经》；李伟国：《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综论》；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补录》；杨铭：《重庆市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目录》《重庆市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目录》；王宇、刘广堂：《旅顺博物馆所藏西域文书》；王珍任、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敦煌写经录及订正》；马大东：《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经卷及社会文书简述》；方广钊：《中国散藏敦煌遗书目录（一）》；方广钊、查永玲：《浙江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方广钊、徐永明：《浙江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方广钊、徐怀农：《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徐怀农：《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考》；王倚平、唐刚卯：《湖北省博物馆藏敦煌经卷概述》；施萍亭、邵惠莉：《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叙录》；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物部：《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等等均对国内各收藏单位所藏敦煌文书中的佛经题记有所收录。

编撰了著录更为完备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也可作为参考。^①能使题记录文与写卷相互参校的当属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各地藏品图录所附之“叙录”，因其参校了以往题记整理成果，录文准确性更高，较少遗漏，并附有前人重要研究成果等参考文献，使用价值极高。各种目录、叙录虽非以题记整理为目的，但亦可使题记资料得以集中呈现，并可与前述专文、专著相互参校。

有关敦煌特殊类别文献题记的整理，也有一些成果。马德《敦煌绢画题记辑录》^②依据日本讲谈社出版的《西域美术》图录，辑录了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绢画题记，拓宽了题记研究的领域，这些题记的内容对我们了解绢画绘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背景有重要意义。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③搜集敦煌写卷、敦煌遗画和莫高窟题记中与学郎有关之题记，对我们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学校教育史、写卷定年，以及对唐宋时代敦煌地方人物传记考证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征、吴伟编校的《敦煌愿文集》^④中从愿文的角度选取材料，校录了99条题记愿文，集中为我们展现了敦煌写本题记所具有的发愿特色，为题记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

题记最初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展示文献面貌而被记录下来，对其整理汇编则目的在于为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提供资料。然而大量资料的汇集使题记呈现为一个类别独立、需要从整体观照的研究对象，并使探究其源流发展、形制特点、内容意旨、文体风格等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展。

（二）题记用作考证资料

题记所助之考证工作，在历史、制度、信仰、风俗等领域均有涉

①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图藏品简目”未著录题记内容；散藏部分的著录体例不一，故而有些著录题记，有些未著，存在收录不全的问题。《新编》较之《总目》更为完备，但仍有许多缺漏及错误之处，本文附录部分将有专文对其校补。

② 《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

③ 《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④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版。

及，成果颇丰。概观之，则多从佛、道二教文献入手。

1. 佛教文献题记

以佛教文献题记考证佛教史的成果最多，要之，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以纪年题记考订文献的年代，进而对敦煌文献整体进行编年连缀者。此类成果中，以姜亮夫《莫高窟年表》^① 和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② 成就最著。前者利用写卷题记、石窟题记等提供的纪年信息，以时间为序，连缀以史实，勾勒出敦煌佛教发展的历史；后者对敦煌文献编年整理的同时，并对每条题记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说明，可为研究的索引。此外，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③、薄小莹《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④ 亦有很大贡献，对本书在历史纵线上考察题记形制的发展及历史成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二，以译经题记、官府写经题记研究译经、写经制度者。研究唐代译经专门问题，如译事沿革、译场制度、译经理论等的前辈学者有梁启超、宇井伯寿、常盘大定、陈垣、吕澂、汤用彤、季羨林、曹仕邦、王文颜、张弓等，以译经题记为基础，对照史传、经录等文献，勾勒唐代佛典翻译之梗概，几成研究者通识。另有学者从译经题记个案来考察记录译场制度的各种资料之间的关系。如梅应运《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之研究》征引译经题记，并参证经录，考知《开元录》实乃依据出经题记撰述。^⑤ 梁丽玲、朱文光《从写经题记看唐代佛典翻译》列举译经制度研究之初仅据史传和经录的不足，通过对译经题记中玄奘和义净译场职事的考察，来说明译经题记与前两种材料结合使用的重要性。^⑥ 写经制度方面，藤枝晃《敦煌出土的长安宫

①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姜亮夫全集》（十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

③ 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董作宾先生全集》第8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

④ 薄小莹：《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

⑤ 《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8期，第235—289页。

⑥ 台湾逢甲大学唐代研究中心、中国文学系编：《唐代文化、文学研究及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5月，第1—12页。

廷写经》^①《敦煌写本概述》^②中已对唐代官方佛经抄写者及官方佛经抄写机构进行了探讨。此后，继论者颇多，探讨的范围不出官方写经的组织机构、书手构成、抄经流程、后勤供给等方面。^③经过多位学者的细致讨论，唐代官方写经制度基本厘清，是本书研究官方写造藏经事业及其对民间写经影响的重要参考。

其三，以题记发愿文考证民间佛教信仰和佛教风俗者。观音、净土、弥勒等常见民间佛教信仰之外，敦煌地区特别流行十王、毗沙门天王、宾头卢等信仰，题记中多有以之为对象的祈愿。研究者一般针对个别信仰类型予以阐释，如释大参《敦煌〈观音经〉题记中的孝道思想》^④探讨观音信仰与儒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何剑平《作为民间写经和礼忏仪式的维摩诘信仰》^⑤从写经和礼忏仪式等方面，讨论了民间的维摩诘信仰不同于知识阶层信仰的特点。而党燕妮博士的论文《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民间佛教信仰研究》则给予前述信仰以全面考察，利用题记材料考察了敦煌地区各种民间佛教信仰的演变历程。关于佛教风俗的研究，笔者所见的有郑阿财《敦煌寺院文书与唐代佛教文化之探赜》，^⑥结合寺院文书和写经题记探讨了四月八日佛诞日的写经风俗。施萍亭《一件完整的社会风俗史资料——敦煌随笔之三》和杜斗城《“七七斋”之源流及敦煌遗书中有关资料的分析》，借助题记资料，对“七七斋”佛教风俗进行了探讨。^⑦

其四，以题记所载供养经题研究佛经流传情况者。方广锬的系列

① 《冢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京都，1961年，第647—667页。

② 此文经徐庆全、李树清翻译后发表在《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

③ 例如，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敦煌写经风俗》一章讨论北魏至隋初流行“一生二校”型的写经班子，初唐至盛唐流行“十一人型”班子；曹之《唐代官方佛经抄本考略》一文对抄经的组织机构进行分析；顾吉辰《唐代敦煌文献写本书手考述》探讨了书手成分、写经情况；魏郭辉《唐代官方佛经抄写制度述论》研究了官方写经的后勤供给措施。

④ 《现代佛教学会通讯》2003年第13期。

⑤ 《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⑥ 台湾逢甲大学唐代研究中心、中国文学系编：《唐代文化、文学研究及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5月，第1—17页。

⑦ 分见《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2004年第4期。

论文^①对《维摩诘所说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佛说佛名经》等在敦煌的流传历史、版本演变及注疏情况做了分析；郑炳林、梁丽玲等学者对《大般若经》《贤愚经》《大般涅槃经》《华严经》等的流传情况和流传原因的分析，^②对本书研究民众写经题材变迁和信仰变化的原因大有帮助。

2. 道教文献题记

敦煌道教文献数量不多，现存的题记资料也较少，对其进行研究和以其为资料做相关研究的论著就比较有限。

董作宾《敦煌纪年》辑录了11条道经题记，据此论及敦煌道经流传的时代和流行经典，但由于所据材料十分有限，因而得出的结论难称完善，不过此文本身仍不失为利用题记探讨敦煌当地道教历史文化的有益尝试。谭蝉雪《敦煌道经题记综述》^③统计了现已公布的道经题记的数量及所涉及的经典，依据题记内容论述了敦煌道教写经的时代、道教及道观分布地域、道经的来源、写经目的、题记中的科仪轨，以及最为流行的几部经典，所论虽为概况，但却是对道教题记研究范围的总结概括。

对敦煌道经的来源与流传、敦煌道教与中原道教关系的考察是研究的重点。敦煌道教文献中最多见者是《道德经》《十戒经》《本际经》，《道德经》与《十戒经》往往结合流传。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根据题记考证了武则天为太子李弘写一切道经的史实，见出敦煌道教和长安道教的交流，并认为《本际经》的流行亦可视为道教西传对佛教东传的一种回应。^④朱大星《敦煌本〈十戒经〉的形

① 方广钊对于敦煌所流行的佛经做了一系列研究，包括《敦煌遗书中的〈维摩诘所说经〉及其注疏》《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敦煌遗书中的〈妙法莲华经〉及有关文献》《关于敦煌遗书〈佛说佛名经〉》。

② 这些文章包括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大般若经〉的流传与信仰》、梁丽玲《〈贤愚经〉在敦煌的流传与发展》、释永有《敦煌遗书中的金刚经》、杨君《〈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崔峰《大般涅槃经在北周和隋代的流行》、李海峰《敦煌遗书中的早期〈华严经〉及其相关文献》。

③ 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24页。

④ 《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成及流传》^①和《敦煌本〈老子〉研究》^②，认为敦煌本《老子》的流传是因其作为学校教材使用、政府颁赐、道教因自身经教传承的需要及世人因消灾祈福等需要而传抄，而敦煌本《老子》与《十戒经》的结合流传，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十戒经》的自身特点是密切相关的。张洪泽《论唐代道教的写经》^③、邵文实《敦煌道教试述》^④等论文则统摄所有道经题记，论述了唐代《道藏》的编撰和道经的传写以及敦煌道教与中原道教的密切关系。

道经题记有一显著特点，即包含了道士、女冠受持经戒时的盟誓文。针对于此的研究，有讨论盟文中所反映的隋唐以降以道观为核心的经教化道教的发展及其与传统科仪之间的矛盾者，如刘永明《盛唐时期敦煌的道观问题——兼论经戒传授盟文中的题名方式》^⑤；有考察盟文的文体源流及其在传授仪式中的功能者，如吴羽《敦煌写本中所见道教〈十戒经〉传授盟文及仪式考略——以P.2347敦煌写本为例》^⑥；亦有考察盟文里中岳先生之称号在长安及敦煌道教徒间的使用情况者，如杨森《武则天至玄宗时代敦煌的三洞法师中岳先生述略》^⑦。

题记中抄写者或受持者题名中包含了许多道观信息，借此对敦煌道观的考察也是一个研究方向，如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⑧对敦煌十座道观：灵图观、神泉观、开元观、龙兴观、冲虚观、玉女娘子观、西云观、老君堂、王母宫、紫极宫的全面介绍。其后则有胡恩厚《敦煌莫高窟道教史迹考察》^⑨、邵文实《敦煌道教试述》等文对其进行补充，并着重考察了敦煌名观“神泉观”的地理

①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② 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5年。

③ 《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

⑤ 《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4期。

⑥ 《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

⑦ 《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⑧ 《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⑨ 《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1期。

位置和历史沿革。^①

（三）以题记为对象之研究

在长期积累的题记汇编整理工作及以题记作为考证资料的研究中，题记的重要性一再被确认，研究工作便朝向独立研究题记文献的方向发展。

最早展开研究的是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的研究生罗汀琳，其论文《敦煌佛经写卷题记初探》探讨了佛教写卷题记的源流、文体风格、内容，认为记录抄校点读、受持供养的题记乃是一种记叙文字，其中祈愿内容一准于金石之例，接近于造像记；其文体风格受不同时代文学风格和译经风格的影响而呈现出或散句记述、质朴无文或文格骈俪、文辞典雅的风格；并通过对题记供养经题、供养人和写经目的的归类分析，阐释了敦煌佛教在帝王倡导、氏族影响的背景下蓬勃发展；在平民中趋于世俗化，实现了宗教的现实性转变，呈现出了在民间的一种升华与圣化。^② 此文将佛经题记视为佛教文化的一类载体来探讨，无论是对它构成要素、形式特点的分析还是对其宗教内涵的揭示，都使我们对题记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在此文的启发下，台湾学者林聪明所撰《从敦煌文书看佛教徒的造经祈福》^③ 及梁丽玲《六朝敦煌佛教写经的供养功德观》^④ 特别从题记中整理出写经的抄写者、供养人身份、写经目的、祈愿对象与内容、供养祈福方式等一一叙述，归纳分析佛教徒造经祈福的情形和宗教意义。近来，兰州大学魏郭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敦煌写本佛经题记研究——以唐宋写经为中心》对写经题记内容和题记抄写者的分析是对前人研究的总结与细化，而在“译经题记研究”“疑伪经题记研究”专题中则

① 相同论题之论文还有杨富学、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藏道教〈十戒经传授盟文〉》、刘永明《盛唐时期敦煌的道观问题——兼论经戒传授盟文中的题名方式》。

② 《国际佛学研究创刊号》1991年第12期。

③ 载汉学研究中心编印《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第521—538页；又见《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217页。

④ 《敦煌学》第二十二辑，1999年，第119—138页。